

學術論文

共識的焦慮：中國媒體知識分子對危機與風險的論述

司景新

摘要

危機傳播是動態的話語衝突與調和過程，風險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危機和風險的治理及秩序的重建是一個權力施用過程。媒體對風險和危機的再現也是相應社會博弈和建構的產物。本文選取《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新週刊》、《三聯生活週刊》四家媒體關於「5.12汶川大地震」、「三鹿毒奶粉事件」、「金融危機」三大公共事件的媒體知識分子時評，運用建構主義話語分析理路進行文本檢視，總結出國家、個人、市場、及公民社會四個共識集束，並探討了中國媒體知識分子如何基於公共利益，建構公共理性，推動危機、風險及其治理的社會共識建構，深化了中國危機傳播研究的批判取向。

關鍵詞：媒體知識分子、危機傳播、社會風險、共識

司景新，武漢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研究領域為媒介文化研究、跨文化傳播。電郵：sjx029@126.com

Research Article

Anxiety about Common Sense: Chinese Media Intellectual's Discourses on Social Risk

Jingxin SI

Abstract

Crisis communication involves discourse conflicts and negotiations. Many social powers attempt to define where the risk lies in a certain society to determine risk administration and reestablishing order. Media representations of crisis and risk become the sphere in which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compete and negotiate.

With this premise, this paper explores commentaries and articles about three major crises in four Chinese liberal publications written by intellectuals. Through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paper identifies four common-sense approaches that include the state, individuals, civil society, and markets to examine how China's media intellectuals pursue real criticism and represent the public's interests. The criticism orientation of this crisis communication study is applied in a Chinese context in this research.

Keywords: media intellectual, crisis communication, risk, common sense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Si, J. (2011). Anxiety about Common Sense: Chinese Media Intellectual's Discourses on Social Risk.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 215–240.

Jingxin SI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culture study,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引言

2008年，中國經歷了年初雪災、汶川大地震、毒奶粉事件、金融海嘯等一系列危機事件，引發媒體關於危機管理、風險治理的集中呈現。官方話語借助風險和危機型塑政府形象、宣揚官方意識型態，運用發展、國家利益、現代化、市場化等結構性表述，把危機消解為政治公關、實施補救和社會動員。而在風險社會中，維護媒體公共領域的理念，以中國社會各群體利益、多元價值觀表達為訴求，拓展協商討論的空間，社會整體受治於理性才能得到保障（徐賁，2009）。知識分子作為社會批判的有力一環，他們的介入和賦權程度，對中國危機傳播話語衝突和協調的走向影響至深。

危機傳播、風險社會與媒體知識分子

20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危機傳播研究經歷了一個從線性模式到情境模式和社會文化批判取向的發展歷程。最初，組織被作為風險處理的核心，務求按照危機發展的脈絡為組織開出合適的診斷書。1972年，危機研究先驅查爾斯·赫曼（Charles Hermann）在《國際危機：從行為研究角度考察》一書中如此定義「危機」：「危機是威脅到決策集團優先目標的一種形式，在這種形式中，決策集團作出反應的時間非常有限，且形勢常常向令決策集團驚奇的方向發展」（Hermann, 1972）。在這類模式的基礎上，曾經發展出兩個不同的路徑，即管理取向和修辭取向。管理取向聚焦於危機傳播中的傳者環節，即組織自身的自主性、專業性及決策能力和傳播效率。修辭取向則聚焦於危機傳播中的信息環節，探討危機發生後的形象管理和辯護策略（史安斌，2008）。

20世紀80年代，烏里爾·羅森塔爾（Uriel Rosenthal）認為赫曼的定義過於狹窄，將對危機的理解擴大到社會系統的層面。在《應對危機：管理災難、暴亂與恐怖主義》一書中，他認為，「危機是對一個社會系統的基本價值和行為規則架構產生重要威脅，並在時間壓力和不確定性極高的情況下必須對其做出決策的事件」（Rosenthal, 1989: 78）。于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也指出，危機是社會系統的目

標、價值觀念的變化超出了其容許的極限、社會系統無法解決其駕馭性問題，且社會的組織原則遭到破壞的必然結果。變化的價值觀念如果不能維持社會系統的有機同一，社會調節系統就無法維持社會的規範結構，社會結構的失序必然導致某些範圍甚至整個社會的危機(哈貝馬斯，2000)。在此基礎上，以庫姆斯(W. T. Coombs)為代表的學者們構建出一套「情境式危機傳播」理論，引入了「危機責任」和「利益攸關方」的概念，認為媒體和公眾對危機責任歸屬的認定決定了組織應當採用的反應策略，確保組織在危機的不同階段所發出的信息及其所採取的傳播、溝通策略能夠對利益攸關方產生影響。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文化理論被引入危機傳播研究當中，形成了危機傳播研究中的批判取向。它把危機傳播看作是一個動態的話語衝突和調和過程，旨在確立一種新的社會共識，從而建立一個有利於組織發展的傳播機制和輿論環境。如麥克黑爾(J. P. McHale)等提出的霸權模式，強調危機傳播是不同組織爭奪在傳媒、文化和意識型態領域內的領導權的過程(史安斌，2008)。

另一個概念就是「風險」(risk)。在風險研究中，西方主要形成了三種理論範式：一是以瑪麗·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為代表，利用文化人類學方法研究風險的「文化—象徵」理論。道格拉斯把風險意識看作是人們應對緊張的一種手段，風險是一種在當代西方社會維護文化邊界的手段。二是艾瓦爾德(F. Ewald)等人借助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思想提出的「治理性」理論。他們認為，從16世紀以來，一個巨大的專家知識網絡已經形成，與之相伴的是圍繞這些知識的建構、再生產、傳播和實踐而出現的各種機器和制度。主張這個理論的學者強調在政府話語或戰略中「風險」的地位和作用，風險被理解為政府使用其訓戒權力的一種戰略。三是以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Ulrich Beck)、英國社會理論家安東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為代表的「風險社會」理論。他們側重於後現代社會中加深人們對風險關心程度的宏觀結構因素，並認為後現代性的核心制度——政府、工業和科學是風險的主要制造者(楊雪冬，2009)。貝克這樣定義「現代社會的風險」，「它是個人和群體在未來遇到傷害的可能性以及對這種可能性的判斷與認知，表徵了現代社會所具有的某種潛在狀態、社會張力乃至危機

水平」(貝克, 2004)。與「風險」相應的概念還有「秩序」與「治理」。風險是對現有秩序的挑戰, 也為構建新, 更加安全的秩序提供了機會。風險的客觀存在與主觀判斷共同決定了一個社會人們會選擇怎樣的工具、方法以及制度安排來應對風險, 這些選擇構成了治理形式, 並產生了相應的秩序。貝克還提出, 風險是社會建構的產物, 每個社會都有它自己的風險目錄。對風險定義的爭論是社會利益衝突的體現形式, 因為如何定義風險直接關乎如何分配風險以及採取哪些措施預防和補償風險(貝克, 2004)。風險可以成為政治動員的主要力量, 對風險的治理和秩序的重建可以是一個權力施用過程, 調整的是治理者與被治理者的關係。同時, 風險也可以帶來對社會的反思, 而被治理者並不是被動的, 也能夠通過自己的策略和行動影響治理者。

西方學術界「危機」概念的變化和風險社會理論的提出是社會和公眾為本的價值觀念凸現的過程。在中國, 危機傳播研究自2003年非典危機之後漸成顯學, 但至今仍基本延續傳統的西方危機傳播研究路徑, 以功能觀點處理, 將傳媒定位為輔助性的工具而非主動的角色, 注重研究媒體如何與政府相互呼應, 化解危機, 修補形象。這種模式將政府和組織預設為危機傳播的主體, 為危機處理提供危機管理和應對策略, 而對媒體在社會風險中的主動性認知建構和參與反思功能則較少關注(史安斌, 2008)。

本文將危機與風險置於中國社會系統和情境當中, 檢視宏觀結構、社會目標、價值觀等制度性安排與危機和風險的關聯, 並採取批判取向, 將危機傳播視為動態的話語衝突和調和過程, 圍繞對危機責任、利益攸關方、治理策略等的論述解構媒體對危機和風險的建構。

本文選擇媒體知識分子關於危機和風險的論述作為檢視文本。從知識分子的歷史和功能看, 公共性和批判性是知識分子的本質特徵。郭中實和陸曄綜合中外學者的論述將知識分子定義為: 掌握了文化知識和技能(通常經過長期、系統的學習和訓練), 以之從事知識、思想和文化產品的創造與流通的職業, 在社會中起到「知識、思想、價值觀念、意識型態等」的「構造」、「闡釋」與「傳播」功能的人。知識分子作為有能力向公眾和為公眾表達的一群人, 他們既遵從自由與正義的普遍原則, 又始終處於普遍性與具體性的互動當中(郭中實、陸曄,

2009)。朱蘇力對媒體知識分子的定義，將其視為越出其專業領域經常在公共媒體上就社會公眾關心的熱點問題發表自己的分析和評論的知識分子，或是由於在特定時期自己專業是社會的熱點問題而把自己專業的知識予以大眾化並且獲得了一定社會關注的知識分子(朱蘇力，2004)。作為公眾生活中的兩大力量，媒體和知識分子的結合可以實現單憑各自力量所無法實現的最大程度地將事實作為真相呈現給公眾的使命。福柯認為，今天的知識分子從自己所處的特殊位置，通過專業分析的方式，揭示真理與權力的不可分割，拆解社會隱蔽的權力關係(福柯，1997)。愛德華·薩義德(Edward Said)積極稱道知識分子與媒體的結合力量，稱今天的知識分子對社會的干預就是去干擾權力利用日益強大的大眾傳媒所散布的形象、官方論調和托詞借口。這種干預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自己在媒體上說真話，一是批判現有媒體，使它從不在乎說假話變為說真話(薩義德，2002)。媒體知識分子作為拆解隱蔽社會權力關係、以專業知識與官方抗衡，行使社會批評職能的一環，參與風險社會中之危機傳播博弈，對公共領域危機和風險的建構和應對策略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本文將分析媒體知識分子如何確認危機責任歸屬、界定利益攸關方、提出何種風險分配以及預防和補償措施，及治理和秩序策略，揭示何種社會情境、系統結構和價值認同。在論述中，又映射出何種普遍原則和對當下中國社會現實的判斷，以及其參與社會危機和風險協商的空間。

研究方法

本文以媒體時評作為分析文本，選擇《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新週刊》、《三聯生活週刊》2008年5月至2009年5月期間關於「5.12四川大地震」、「三鹿毒奶粉事件」、「金融危機」三大事件的媒體知識分子評論做文本檢視。2002年3月4日，《南方都市報》在國內率先開辦時評版，隨後又增加個論版，採取欄目專欄與個人專欄相結合的形式，刊登國內和海外學者、同行記者的時評文章。《南方週末》則以《方舟評論》專欄和《自由談》版給學者開辟時評專欄。在新聞時事週刊方面，《三聯生活週刊》(以下簡稱《三聯》)和《新週刊》作為時事生活類

週刊，也是知識分子縱論時事、關心時代發展的重要平台。其中，《三聯》將自己的讀者對象定位為受過高等教育、關心時代發展進程，不斷從中尋找自己的新型知識分子，《新週刊》試圖影響意見領袖，注重觀點集納（柳劍能、張志安，2007），他們的記者編輯自身也是具社會影響力的知識分子型媒體人。

上述三大事件具典型性。大地震影響廣，各利益群體、不同價值觀在救災賑災過程中爭論較量顯著，彰顯出中國社會博弈的基本面；三鹿毒奶粉事件凸顯市場與政府、公眾利益之間的結構性關係失調與重建矛盾；金融危機將中國社會矛盾放大到國家利益層面，凸顯中國在出入全球化過程中如何規避風險、實現自身轉型。同時，這三大危機事件不是孤立的偶發事件，它們背後呈現出的中國社會系統的基本價值和行為框架一脈相承。因此，將這三個事件的時評進行統合交叉研究，將呈現出圍繞公共危機和社會風險中國社會博弈以及媒體空間的基本面貌。

本文將日報、週報、新聞週刊的內容交叉分析，旨在針對多樣性的媒體定位和論述風格，覆蓋時評話題的廣泛性，體現專家、媒體人等多元化作者對於危機和風險的多層面表達。這四家媒體的定位使其對作者的選擇和話題的切入更具自由主義傾向，因此使得本文對媒體知識分子的分析能夠與建制內的媒體話語保持距離，展現其現實批判和理性思辨的維度。

本文採集2008年5月至2009年5月期間關於三個危機事件的相關知識分子評論，以建構主義話語分析(discourse analysis)為主要理論基礎和分析方法(李金銓，2004)，進行排比閱讀和歸納分析。這一時期既涵蓋5.12大地震發生一年間的所有相關評論，三鹿毒奶粉事件及其後續評論，也是圍繞金融危機評論議題的全面展開集中時段。研究將就時評議題、關鍵詞、標題、描述、及範例等層面加以分析。通過建構時評話語分析框架、總結共識集束(common sense packages)、檢視媒體知識分子如何借着一組論述建構中國的風險、治理及秩序，在文本中定義風險、歸類責任、區別利益、形構關聯。

論述分析

一、誰在論說危機和風險

本研究涉及到的媒體知識分子作者依據其隸屬之專業機構，可分為三類，即來自大學及公立研究機構的學者專家，來自民間機構的研究者和獨立評論人，來自媒體的時評作者。他們的專業領域、問題意識及價值取向如下：

1. 學者專家

作者及專業領域主要有：張鳴，政治學；何懷宏，哲學；唐昊，法學；章立凡，近代史；劉煜輝、周滌華，金融學；雷頤，近代思想史；張千帆，法學、政府管理學；楊濤，貨幣理論與政策；郭巍青，公共政策、地方治理；邵建，文學；蕭雪慧，倫理學；郭金興，經濟學；陳建華、羅志田，歷史學；錢瑣橋，比較文學；莊禮，國際政治；徐賁、薛涌，旅美學者；劉瑜，旅英學者，李冬木，旅日學者。

學者專家主要來自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歷史學、哲學、經濟學等專業。他們共同的背景是，在其專業領域的研究中，多以政治民主化、經濟市場化、文化多元化為取向，以人權、近代史、公共政策等中國社會結構和現代化問題為主要學術興趣。如郭巍青，主要研究公共政策、政治制度、地方治理。邵建，從事思想史、胡適、魯迅研究等。張鳴，著有《鄉村社會權力和文化結構的變遷》。章立凡，著述涵蓋北洋軍閥史、中國社團黨派史等領域。雷頤，主研方向是中國近代思想史與當代中國史。而旅居海外的中國知識分子，以對西方社會思想和政治架構嚴謹而立體的觀察研究為背景，切入中國問題的討論，如文化學者徐賁，著有《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政治學者劉瑜，著有《民主的細節》等。

2. 民間或獨立經濟政策諮詢者

這些知識分子或隸屬民間經濟研究機構，或是獨立的經濟學者和評論人。其中，吳向宏，任職國際商業與投資顧問，曾短暫供職於國務院研究室。秋風，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研究員，主要從事古典自由

主義理論的譯介研究，譯有《法國大革命講稿》、《知識分子為甚麼反對市場》等。沈洪溥，中國信達資產管理公司研究中心研究員；馬國書，共贏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葉檀，經濟評論人。他們多為經濟領域的市場派，文化上的保守主義者，相信具體案例、歷史觀與經濟理論的結合。

3. 媒體從業者

媒體人是時評作者中相當活躍的一群。他們有：長平，《南都週刊》原副總編輯；陳敏，（筆名笑蜀），《南方周末》評論員；鄢烈山，時評家；何三畏，《南方人物週刊》主筆；王志安，中央電視台評論員；張田勘，《百科知識》雜誌副主編；朱偉，《三聯》主編；謝九，《三聯》主筆；梁文道，香港媒體人，社會活動分子；劉洪波，《長江日報》評論員；錢鋼，《唐山大地震》作者；洪晃，《世界都市 ILOOK》雜誌主編；以及《新週刊》執行副總編何樹青、主編朱慧憬、總主筆蕭鋒等。

這些媒體人時評作者具備豐富媒體從業經歷，熟練掌握評說工具，並在其寫作中主張新聞自由、進行歷史省思。如長平，曾先後擔任《南方週末》新聞部主任，《外灘畫報》副總編輯，《南都週刊》副總編輯，因發表《西藏：真相與民族主義情緒》、呼吁新聞自由而被撤職。陳敏，著有《劉文彩真相》、《背上十字架的科學——蘇聯遺傳學劫難紀實》等。梁文道，鳳凰衛視讀書節目主持人，著有《常識》、《弱水三千：梁文道書話》等。

二、共識集束及評論數量分布

本文先將時評文本從危機和風險的責任、利益、及其治理策略進行解構，再將其置於社會系統中，從現代社會管理和風險治理視角進行重構。

現代社會管理理論認為，現代社會管理是多個主體互動形成的權利關係與復合治理模式，是控制與服務有機結合的過程。國家組織、非政府組織、企業、家庭、個人等在內的所有社會組織和行為者都是社會管理的主體和治理的參與者，不能被排斥在治理過程之外。這一

過程不僅是對個體社會成員的控制，而且是通過組織化的方式對個體社會成員權利的保障和實現。復合治理也是一種合作互補關係。只有合作，國家、市場以及公民社會這三大現代治理機制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並彌補相互的缺陷。而且，這種合作不僅僅是民族國家內部的，還是國際性和全球性的(楊雪冬，2009)。國家是其中功能最完備，覆蓋範圍最廣的組織，是社會管理的核心主體。市場經濟、主權國家、公民社會形成了社會管理的基本結構。個人是復合治理最基本的單位，個人的自覺性和能動性及風險意識，個人是否將制度安排貫徹到行動中，是使治理可持續運轉的保障。

關於國家和風險的關係，貝克指出，作為公共權力的掌握者，國家應對着三類風險：組織社會成員應對自然風險；調解社會內部關係，緩和階層衝突的風險；避免其他社會攻擊的風險。國家治理的根本目的是調節社會內部關係，只有這樣才能維持國家的合法性並保持已經建立的秩序(貝克，2004)。國家在整個治理結構中的中心地位，使得絕大多數治理失效的根本原因不是公民社會和市場，而是國家本身。國家中心的治理失效有三種基本形式：結構性失效、制度性失效以及政策性失效(楊雪冬，2006)。這三種形式的治理失效出現在政治、社會、經濟以及文化諸多領域，直接或者間接地動搖了或者沖擊着既有的穩定的社會秩序，影響着社會安全。

個人和家庭是私人領域治理的基本單位或機制，是公共領域中形成規則的最根本的、最直接的踐行者，也是外部風險內在化最生動的實踐者，構成了公共領域治理的微觀基礎和必要補充。

公民社會填補了國家和市場治理所遺漏和無法達到的領域。志願行動、各類非政府組織和非營利組織是公民社會運行的重要方式。就整個治理形態而言，公民社會可以調動必要的人力和物力來解決整個社會遇到的具體問題，減少公共權力對私人生活的直接干預，也把私人領域中形成的共識通過言論及行動轉達給公共權力，同時減少市場對社會的過度侵入。公民社會內部發生巨大的斷裂就會使得社會的集體行動難以達成，既不能有效地制衡國家和市場，弱化它們帶來的風險，也可能在社會內部誘發衝突和矛盾的危險，破壞整個社會的團結。

市場與國家建立了密切而且相互支持的關係。市場是生產風險的

機制，成為現代社會的重要風險來源，其運行失誤會導致經濟動蕩，並進而誘發更大範圍的社會政治風險，而這種風險在今天則是全球性的。

圍繞國家、個人、市場及公民社會這四個權利責任及治理主體，媒體知識分子對中國危機和風險的成因及責任歸屬，各利益方的權利、責任及利益關係，以及治理措施和秩序重構，作出了判斷和分析，其共識集束及數量分布情況如表一和表二所示：

表一：共識集束及評論數量分布

		國家	個人	公民社會	市場	合計
《南方周末》	汶川地震	8	11	5	2	26
	金融海嘯	29	3	2	11	45
	毒奶粉事件	6	1	2	2	11
《南方都市報》	汶川地震	19	15	6	1	41
	金融海嘯	26	1	2	4	33
	毒奶粉事件	10	1	3	6	20
《新週刊》	汶川地震	3	12	2	0	17
	金融海嘯	4	10	1	1	16
	毒奶粉事件	0	0	0	0	0
《三聯生活週刊》	汶川地震	4	4	1	0	9
	金融海嘯	9	2	0	2	13
	毒奶粉事件	1	0	0	1	2
合計		119	60	24	30	233

表二：《新週刊》及《三聯》評論所涉專題

	汶川地震	金融海嘯
《新週刊》	2008年第11期：〈偉大的透明和國家的成人禮〉 2008年第12期：〈活着：改變的和不可改變的〉 2009年第9期：〈口述5.12：汶川大地震1周年祭〉	2008年第23期：〈這個冬天怎麼過〉 2009年第4期：〈不差錢，就缺朋友：蕭條時代的經濟學〉 2009年第10期：〈壞經濟會讓人變好嗎〉
《三聯生活週刊》	2008年第18期：〈生命高於一切：汶川地震舉國大救援〉 2008年第19期：〈我們都要一個家〉 2008年第20期：〈應急的速度：13億同胞心靈正被洗滌〉 2008年第21期：〈吾國吾民：救災改變的國民觀念〉 2009年第16期：〈四川精神進行時：中國重建模式與制度變遷〉	2008年第23期：〈保衛股市：救市的行政與市場途徑〉 2008年第26期：〈中國製造業的出路〉 2008年第36期：〈正在流血的賺錢機器：華爾街風暴後的中美角色轉換〉 2008年第41期：〈中產階級的自救與他救：股市樓市中的政府作用力〉 2009年第8期：〈讓利於民與經濟振興〉

三、共識集束及其具體論述：

各共識集束的關鍵詞、議題及主要觀點如表三所示：

表三：各共識集束關鍵詞、議題及主要觀點

	國家	個人	公民社會	市場
關鍵詞	凝聚力、體制漏洞、政策失效、利益集團、信用危機	生命、自我膨脹、物欲、感恩、責任、利他	志願者、民間參與、民主自治、權利均衡	市場機制、行業規則、道德底線、法律調節
議題1	國家的凝聚作用：地震中的舉國之力，金融危機中強制性資源集中調節矛盾	大寫的人權：生命權、財產權、尊重人性	民間參與和民間自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市場機制的不完善和無序帶來社會風險
議題2	結構性失效：政府的的功能定位和權力來源，救市舉措中政府是直接利益方，官場中取悅於上而無視民瘼的傾向	生活方式及價值觀之困：重新審視人和自然、人和人的關係，自我膨脹的災民	公民社會的基礎：信息公開、相互信賴	回歸市場根本
議題3	制度性失效：地震凸顯社會福利、社會慈善、社會服務等制度的薄弱；金融危機顯示政府主導的金融監管、消費模式、金融機制缺陷，整個系統失靈；奶粉事件中政府不對人民負責，監管體系缺失	重拾正義與規則：自由與責任、職業道德、潛規則	政府與公民社會的關係	
議題4	風險治理及秩序：制度建設，打破官民壁壘；經濟轉型			

I. 國家

媒體知識分子肯定國家作為現代危機治理的核心，其權威性確保了它成為整個社會最具有凝聚力的認同對象，使社會在危急時刻緊密整合在一起，也對國家長期處於治理結構的中心地位，治理形態的單一化導致「有組織地不負責任」的風險困境，並造成的各種治理的失效，提出了明確的質疑。

議題1：國家的凝聚作用

朱偉在〈吾國吾民：救災改變的國民概念〉(《三聯》，2008.6.12)中肯定了汶川地震中，「以軍民協調臨時性行政組織為特點的中國災害衛生救援體制，國、民在其中水乳交融所形成的空前凝集力，才導致了真正的舉國之力。」而在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中，「國家強制性和規範性和滲透力使社會可以集中資源進行公共經濟秩序的調整和緩和社會內部矛盾並避免經濟危機的進一步侵襲。」

議題2：結構性失效

更多的評論指出政府治理能力軟弱，無法負擔起應有的、提供社會秩序和社會安全的功能，更無法保證市場和公民社會的正常運行。學者張鳴在〈政府道歉的標準文本〉(《南都》，2008.10.2)中指出，三鹿奶粉事件石家莊政府的公開道歉，反映「地方政府的所謂政治敏感是不給上級機關惹麻煩，而不是受毒奶粉傷害的廣大百姓的生命和健康」。另一位學者蕭雪慧〈在寄望於「君子人格」靠不住〉(《南週》，2008.9.12)中也認為，毒奶粉事件反映出「目前體制漏洞給了官員很大空間在謀取私利上伸展拳腳，如果不能釐清權力來源，就無法克服官場中取悅於上而無視民瘼的傾向；如果權力缺乏有效的監督制衡，權力的胡作非為也很難遏制。」

在金融危機中，學者邵建更明確指出，各地政府急於出手〈拯救樓市並非「道德正義」〉(《南都》，2008.10.25)因為在房地產市場中，「地方政府直接就是第一利益方，注定與正義無關，而地方政府在救市的舉措中，首先謀取的是自己的利益。」媒體人蕭鋒也稱〈僅有「個人信用」是不夠的〉(《新週刊》，2009.5.12)，現在最大的信用危機是政府信用，「股市宏觀政策朝三暮四，證監會失信於股民，不僅使中國股市深陷泥沼，也使國家信譽嚴重受損。」

議題3：制度性失效

結構性失效帶來的是規則的明顯缺陷、政策失效，而周期性政策失效必然導致制度失效。如郭巍青在〈將社會保障制度作為災後重建的

重心》(《南都》，2008.5.25)中認為，「目前的社會保障制度十分薄弱，地震對政府提出了建立好災後對災區人民的社會福利、社會慈善、社會服務等制度的要求」。學者劉瑜認為，要〈讓地震中的愛心大爆發變成制度〉(《南週》，2008.5.29)，還需克服中國慈善事業的制度瓶頸，如「民間慈善組織發展的限制，捐款的稅收減免問題，及慈善組織的公開透明性問題。」

法學家張千帆認為〈政府必須保障食品安全〉(《南都》，2008.9.27)，市場的失靈即意味着政府的責任。他提醒〈食品安全需要司法保障〉(《南都》，2008.10.2)「高官問責制彌補不了中國行政執法體制中的疏漏，如果不能從制度上保證政府對人民負責，重新確認並承擔起不可推卸的監管責任，從根本上重構中國的執法體制，沒有甚麼能保證三鹿奶粉的悲劇不會重演。」

面對金融危機，時評作者們更是直指政府主導的金融監管、消費模式、金融機制的缺陷，認為是整個系統的失靈引發了全面的危機。學者劉焜輝在〈中國該不該參與美國救市〉(《南都》，2008.10.9)中認為，美國經濟崩塌對中國經濟造成的重大沖擊，是我們為既往過度依賴高投入和出口的錯誤經濟模式支付的沉重代價。經濟學者馬光遠在〈「全球最貴股市」是一針清醒劑〉(《南都》，2009.1.15)中認為，中國內地股市存在諸多問題：「畸形的發行制度，惡意圈錢的再融資制度，支離破碎的監管，違法成本太低，導致中小投資者的利益屢屢受損，投資者的信心貧血。」經濟學者沈洪溥在〈美國救房市，中國不必學〉(《南都》，2008.8.3)中認為，「急吼吼地啟動施救政策，不僅無法起到直接提升民眾福祉，維護經濟穩定的良好作用，反而可能以政府默認價格合理性的方式，間接為開發商團體輸送利益」。

議題4：風險治理及秩序

時評作者們認為，是國家與公民社會、市場的關係不平衡，擠佔了後兩者的邊界，從而誘發了後兩者的失效，並造成了治理的軟弱。國家治理機制只有通過與日益壯大的市場機制、新興的公民社會機制的不斷互動，才能形成一個結構緊密、環節眾多、相互進行反思性監控的現代治理形態。

學者秋風在〈多難何以興邦〉(《南都》，2008.5.28)中認為，災難中激發出來的同胞意識、仁善之心為支持它的制度框架提供了機會和精神基礎。它使人們更強烈地要求政府在救災時公正、廉潔，打破官民之間的壁壘。對於金融危機，學者劉煜輝探討〈中國該不該參與美國救市〉(《南都》，2008.10.19)時認為，政府「只有徹底和過去的模式告別，通過資源性產品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的改革，財富分配上的調整，堅定地轉向內需消費主導的經濟體，以有利於未來經濟徹底轉型為條件參與救市，才能不再為同樣的錯誤繼續埋單」。馬光遠在〈價格合理，房地產才有刺激內需之用〉(《南都》，2008.10.27)中認為，破除中國房地產公共政策「囚徒困境」的關鍵在於「主動捅破房地產泡沫，從制度設計上重構，使政府從一個政策的利益方成為中立者」。在〈十大專家的建議是救市還是在毀市?〉(《南都》，2008.12.2)中他認為，資本市場強大的真正之道，在於「通過制度的支點，恢復應有的股市公平，建立股市民主」。

II. 個人

議題1：大寫的人權

學者張田勘在〈死者的歸宿關乎生者的安寧〉(《南都》，2008.5.13)中認為，為汶川大地震中死難者降半旗志哀，舉行全國統一的悼念，收集無名遺體的DNA等做法體現了對死者和生命的尊重，和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陳舊在〈這是一次情感教育〉(《新週刊》，2008.5.22)中認為，「國家公民從抽象的人民概念裡走出來，成為了一個個鮮活存在的人」。慈善無貴賤，愛心無大小。朱慧璟在〈這是一次生命教育〉(《新週刊》，2008.5.22)認為，這次前所未有的劫難「教育人們懂得關愛，懂得感恩，懂得責任，關愛自己和其他生命」。

時評也指出，災難讓我們看到我們對心靈的呵護和道德的堅持都十分的脆弱和模糊。災難中情感的重建、心理的援助被提到了重要位置。何三畏在〈地震廢墟旁復課合適嗎?〉(《南都》，2008.5.27)中認為，地震中遭受重創的學校在廢墟旁高調復課，「堅強得可怕，而這樣的堅強，將來會給孩子造成人性的某種缺失」。媒體人王志安〈感恩之

心與產權保護》(《南都》，2008.6.3)，分析捐款排行和指摘富人和部分企業是鐵公雞的道德撻伐現象。「捐錢相助還要受到道義上的譴責，在古今中外都是相當罕見的事情。沒有形成對私有財產完全保護的共識，同時抱着原罪心態看待富人的財產，是逼捐的社會基礎」。

議題2：生活方式及價值觀之困

知識分子反思危機給當前中國人的生活目標及價值觀念帶來的沖擊。林奇在〈這是一次災難教育〉(《新週刊》，2008.5.22)中認為，「中國人歷來是一個忘性很大而且實用至上的民族，災難讓我們重新審視人和自然、人和人的關係。曾經被詬病的城市人的日漸疏離與陌生關係，在這次災難面前被守望相助的熱情所沖破。」馬孔多〈我們都是人類自我膨脹的災民〉(《新週刊》，2008.5.22)認為，中國膨脹的自我與發展的幻覺把自己變成了自我膨脹的災民。「我們僅用了不到30年的時間，走完了西方500年走過的路。而這種急急忙忙、粗制濫造地趕制出來的壓縮餅干，是以耗費了寶貴的能源、破壞自然的生態為代價的」。

哲學家何懷宏在〈聰明超脫生活也可變豐富〉(《新週刊》，2009.5.19)中認為，「全球化的經濟出了問題，根子可能恰恰在於我們過分重視經濟和物質生活，而且不講量入為出、量力而行」。媒體人洪晃〈壞人少了幾個，但並不意味着好人就多了〉(《新週刊》，2009.5.19)認為，我們「完全接受了美國夢的價值觀念，張開大嘴吞下了『成功』這粒毒藥。西化的生活樣板和生活常識界定了我們的價值觀。」物欲生活方式下的中國災民再次站在生活的柺點之上。

議題3：重拾正義與規則

針對中學教師范美忠地震丟下學生跑出教室，事後以「我是一個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所做的辯解，雜文家鄢烈山在〈「范跑跑」事件的要害是甚麼〉(《南都》，2008.6.2)中提出，契約意識是一個社會的底線和共識，恪盡職守的職業道德，比大公無私的道德高調或反道德的本能低調都更有利於社會發展與和諧。學者景凱旋的〈應如何理解自由與責任〉(《南都》，2008.6.7)、學者邵建的〈范美忠事件的「自由」誤讀〉

(《南都》，2008.6.8)，都在進一步釐清，自由主義不是不加限制，而是與責任相對應。徐賁引用康德等哲學家及二戰時期猶太人受到救助的例子探討〈人為甚麼有利他行為〉(《南週》，2008.7.11)，認為利他行為發生在日常生活的不同具體領域中，更顯現一個社會的正義水平。

笑蜀在〈永絕三鹿惡之花有待人心改造〉(《南週》，2008.9.25)中認為，沒有價值上的人心上的堅實支撐，再先進的體制也不會有生命力。三鹿醜聞的背後，是潛規則與明規則、及現代治理體制的尖銳衝突。潛規則斬斷了現代治理體制的根系，最終顛覆監管體制，導致了食品安全監管的空心化。

III. 公民社會

議題1：民間參與和民間自治的必要性

時評作者們指出，無論是救災，還是治理經濟環境、應對經濟危機，都提出了在中國促進民間參與、打破官民壁壘、喚起公民社會的力量、實現民間自治的要求。媒體人蕭鋒認為，「趕赴抗震救災一線的志願者共計20萬人，成了災區人數最多的一支救援力量，也是中國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志願者行動。」媒體人梁文道指出，〈公民道德復現於賑災重建中〉(《南都》，2008.5.23)，「大型災害之中，爭分奪秒，不能把籌碼全押在一個巨型機構上。以民間團體為代表的公民社會在救災的反應速度，房屋重建、經濟活動、心理健康與社會紐帶的恢復上，都具備優勢，沒有民間自主力量的參與，任何由上而下的外在方案恐怕都是不現實的。」學者秋風認為〈房屋重建主體在民〉(《南都》，2008.6.1)，民眾應發揮主導作用，重建決策應當由民眾自己作出，涉及到公共領域的問題，則應當通過民主、自治的方式集體作出。

議題2：公民社會的基礎：信息公開、相互信賴

胡赳赳、潘濱在〈這是一次傳媒教育〉(《新週刊》，2008.5.22)認為，汶川大地震後，各家媒體幾乎都派出一線記者採訪。傳達信息，透明災情，現場報道，這是媒體應有之義。「網絡、博客等民間自發的報道熱情，個人視角、平民關懷、信息披露，扮演着新聞線人和民間

通訊社的角色。」薛涌在〈以救難超越受難〉(《南週》，2008.5.31)中提出，希望「無論是救難的還是受難的，都把在這次大難中所領受的陌生人間的愛當真，並回報給其他素不相識的人。這樣，公民才能建立起彼此之間的信賴和承擔。每個人都願意生活在由這樣的公民所組成的社會。」

議題3：政府與民間社會的結合

國際商業顧問吳向宏在〈既獨立於政府，也獨立於市場〉(《南都》，2008.5.30)中認為，賑災善款使用需要的良好公信力，在目前社會公信腐蝕，既無法通過政府權力強制建立，也不能通過市場競爭自發實現的現狀下，應通過社會來達成。陳敏在〈災區重建應以民間主導〉(《南週》，2008.6.4)中認為，災區重建應以民為主，官民合作。「鼓勵民間資源介入，用專業NGO擅長的個性化服務與政府擅長的普遍的、均等化的公共服務形成互補，並逐漸摸索出政府與專業NGO良性互動的長效機制。民間志願者可發揮在工程進度監管、工程質量監管等方面更客觀更公正，監管成本低等優勢，杜絕災區重建過程中的腐敗現象。」

學者唐昊在〈公民社會如何確保食品安全〉(《南都》，2008.9.25)中指出，「政府和企業都靠不住的時候，要最大限度地防範公共危機，就必須喚起公民社會的力量，促使惟利是圖的企業和遲鈍不前的政府向正確的方向邁進。」笑蜀在〈權利均衡才能有效抗擊國家風險〉(《南週》，2008.10.30)中認為，大踏步的國進民退，使全部戰略資源、高端資源統統集中在政府手上，很少分散風險的空間。一個國家最好的危機減震器，就是風險分散機制。即在投資驅動和內生驅動之間找到平衡，讓民間有權參與進來、有力量參與進來，與國家共度時艱。

VI. 市場

議題1：市場機制的不完善帶來社會風險

秋風在〈乳品行業自救之道在於自治〉(《南都》，2008.9.27)中認為，「中國奶制品行業的墮落在於沒有最基本的自我治理機制的無序競爭。自救之道在於真正自願而又有效的行業自我治理、關注行業的公

共利益、運用各種合法、合情、合理的手段維護本行業的秩序。」學者梁文道在〈毒奶粉事件與品牌泡沫〉(《南都》，2008.9.27)中指出，「改革開放30年，一堆大型民族品牌的興起，靠的不是苦心經營自己的產品質量，日積月累地建立起自己的聲譽，而是仰仗那些舶來的商貿潮流知識及術語，公關廣告，捨本而逐末。毒奶粉事件就是過去15年中國經濟發展的某種泡沫爆破了，是企業道德底線失守的危機。」

議題2：回歸市場根本

學者葉檀在〈房地產業必須刮骨療毒〉(《南都》，2008.10.18)、〈房市調控矯枉必須過正〉(《南都》，2008.10.12)中認為，「如果不解決引發市場供需矛盾的根本問題——價格虛高，卻巴望政府救市，對改善房地產業的盈利模式、化解泡沫風險毫無助益。以危害公共安全和利益的行為無限要求超市場經濟待遇是不合理的。從這個角度說，無論開發商的同行上書，還是投機客的退房鬧市，都表明房地產市場供方和少數買方仍存在嚴重幻覺。」

媒體人王志安〈從公司治理結構看萬科捐款門事件〉(《南都》，2008.5.27)認為，「對於上市公司的管理層來說，做公益、捐善款當然是善，但尊重公司的管理章程，在既定的遊戲規則範圍內行使權力，同樣是善，製造洶洶民意，強迫王石超越公司授權，貿然宣布更大的捐款數額，是為了一種善，而傷害另一種善。對於一個現代社會來說，需要處理的恰是各種權利之間在法律範圍內的有序協調。」

討論及建議

一、知識分子風險論述的空間與邊界

國家中心治理有限性的風險責任歸屬，以及公共利益的風險治理出發點是媒體知識分子時評的核心表達。媒體知識分子關於社會風險的論述篇幅，以國家治理議題數量最多，其後依次為個人、市場及公民社會。時評直指政府與特殊利益集團捆綁，對社會失序負有主要責任。行政手段失效、司法制度缺失、對市場和公共領域的干預過多、

使得公共利益未能得到充分維護。顯示他們試圖從權力結構、制度構建等根本性問題上質疑和挑戰目前國家中心治理的有限性。並就此提出，在保持國家有效性的同時，明確界定個人、公民社會、市場以及國家的職能，合理地分配風險，建構多中心的、合作式的複合治理模式。

中國當前危機和風險論述的公共空間隨着危機的頻發和影響巨大必將擴大。危機發生後，生命的危急、民怨的堆積使政府理性反思的壓力增大，此時，政府、人民都需要更為理性地釐清真相、尋找出路、渡過難關。國家權力出於其現實政治需要，給質疑和批判聲音留下了一定的空間。而中國現時危機中，受到影響最大的除了普通民眾、草根階層，還有物質生活正在走向富足的中產階層。強烈的危機和風險意識，帶來整個社會各階層反省的共同需要，也為對體制的質疑批評提供了輿論的基礎。

關於現代社會風險治理的另外兩個重要環節，公民社會和市場，知識分子的論述篇幅有限，尤其是對於實現對政府公權力的監督和人民利益至關重要的公民社會這一議題的論述篇幅最少。但就有限篇幅來說，時評提出了建立公民自治社會的必要性、以及公民文化、公民道德等公民社會重要理念，並就在災區重建等具體行動中如何發揮民間力量給出建議，但對公民社會的體制性建構問題和相應的治理理念卻不曾涉足。在市場這一治理層面，時評作者們在救市措施、股市房市崩潰原因等方面，提出了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結構轉型、資源配置方式調整等具體措施，也指出經濟制度設計的真正利益出發點應回歸到人民，但並未就此將對策引向相關政治體制改革的探討。顯見由於缺少具有一定自治性的社會層面的依托，媒體知識分子的發言空間雖在社會風險中有所鬆動，能夠歸因政府責任、重申公共利益、建議建立公民社會，卻無法更進一步做出系統化闡明。

二、以專業智識和常識論述建構風險理性

媒體知識分子中，來自學院的知識精英多有跨越自身領域的制度、結構、歷史關懷及普世價值觀，反映他們都是入世的積極參與中

國社會發展進程的知識分子。也有作者來自熟悉政府決策、現實規則及具有專業知識的民間研究機構、還包括富有社會責任感的媒體人。他們沒有單純就危機和風險本身作出功能式的分析，而是運用專業智識以及理性思辨，為人們認識危機和風險背後暗藏的制度、規則和人心的變形提供資源。

從論述方式和引述觀點來看，媒體知識分子以西方現代化和後現代理論為主要思想資源，對西方政治學、哲學、經濟理論等社會科學往往追溯經典論述，實現的是根本性的制度、理念啟蒙。引用的經驗、對比個案多為美國、英國等西方發達現代化國家。對政治體制、司法運作、現代企業規制、人權、平等、民主、正義、人和自然和諧共存等普世價值做出充分闡發，試圖從社會系統基本價值體系和行為框架上重塑公共理性。但對中國社會文化的批判維度，如積重難返的中國官場文化、官僚體系、潛規則對市場的侵襲、對個體意識的壓抑等則論及不多。

面對社會危機和風險，媒體知識分子以公共利益作為基本立足點，幫助人們用理性的方式重新審查規則和制度，並將對社會風險及其治理的探尋進入了社會系統的基本價值、行為框架和制度層面，在此基礎上重新問題化，為人們建構新的共識。如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識》(*Common Sense*)是美國的奠基檔之一，美國社會學家米爾斯(C. Wright Mills)說出版的意義是讓一種想法交之於世，交給公眾研判思考、再醞釀變化社會的土壤(梁文道，2009)。這些媒體知識分子對常識、共識的追問和建構，既是針對公共危機開出的現實藥方，更是運用批判性思維實現多元公共辯論的創造性媒體實踐。

三、在多元形態風險共存中尋找共識

對於如何避免風險，媒體知識分子的論述，也反映了他們對秩序和前景的判斷，充滿着矛盾的經驗及道德困惑。在傳統社會中，自然災害是生存的最大威脅，以家庭為核心的血緣共同體是治理的基本載體；在現代社會，民族國家成為治理結構的中心，一系列現代制度的建立和技術的應用提高了人類應對自然的能力，也帶來了制度風險和

技術風險；隨着全球化進程的加快，風險社會產生，不僅對現代制度和技術的合法化與有效性提出了挑戰，而且滲透到個人生活之中，轉化成生活風險（楊雪冬，2006）。

從媒體知識分子的時評中可以看到，中國正處於這三種形態風險共生的多元化風險社會當中。不僅面臨民族血緣共同體價值觀念分崩離散的脆弱體系中，國家治理脆弱、現代官僚制度、公共領域、市場體系都尚未發育完善，同時又遭遇到經濟全球化的沖擊。不僅個人、公民社會、國家以及市場的職能需要明確界定，每個領域的結構建設、價值底線以及內在規則，都需要長期持續的推動和共識。如果說，全球化時代的風險社會主要面臨的是個體的理性與集體的非理性的困境，那麼在中國，個體辨別風險、判斷風險和應對風險所需要的理性，與集體共識的極度缺乏造成了風險的加劇及治理的艱巨。在風險面前，尋找最低共識、進行合作，突破既有的利益障礙，是保全每個人的利益、走出困境的基礎。

在媒體知識分子的論述中，體現出共識的焦慮，和焦慮的共識：它們是現代化與後現代矛盾的糾結，張揚個人主義同個人欲望膨脹的矛盾；市場的消費陷阱與政府對市場的失察，公民社會的建立與公民道德與意識的匱乏；西方理想社會治理模式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喪失；具體治理和人民的福祉與社會機制的全面潰敗。而這種焦慮正是民主化社會的先聲，也是未來中國關於危機和風險的公共領域中要推進的方向，即促使人們更多元、多維、理性地思考和判斷，在具體事實中獲得一點知識，在多種立場中找尋自己的位置，在進退考量中衡量利益，從而讓各種浮躁、混亂的社會思潮得以通過協商和鬥爭、妥協和交融進行沉澱，尋找到風險治理及秩序的真正出口。

本論文運用批判取向，將危機傳播看作動態的話語衝突和調和過程，通過媒體知識分子關於的危機和風險的論述，對話語公共性進行描述和反思。並結合社會、文化領域對風險及其治理的研究，提出了風險論述的共識集束。而圍繞中國危機和風險的公共領域的現狀和建構，尚有其他社會階層的風險論述、新媒體技術帶來的話語博弈的變局、以及官方話語與非官方話語的互搏等研究課題有待開拓。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Ulrich Beck 著 (2004)。《風險社會》(何博聞譯)。南京：譯林出版社。
- Ulrich Beck (2004). *Fengxian shehui* (Translated by He Bowen). Nanjing: Yil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Beck, U. [1992].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 Ulrich Beck、Anthony Giddens、Scott Lash 著 (2001)。《自反現代性：現代社會秩序中的政治、傳統與美學》(趙文書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 Ulrich Beck, Anthony Giddens, & Scott Lash. (2001). *Zifan xiandaixing: Xiandai shehui zhixu zhong de zhengzhi, chuantong yu meixue* (Translated by Zhao Wenshu).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Original book: Beck, U., Giddens, A., & Lash, S. [1994].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olitics, tradition and aesthetics in the modern*. Chicag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chel Foucault 著 (1997)。《權力的眼睛：福柯訪談錄》(嚴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Michel Foucault. (1997). *Quanli de yanjing: Fuke fangtanlu* (Translated by Yan Feng).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Foucault, M. [2006]. *Psychiatric Power: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3–1974*. Michel Foucaul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Jürgen Habermas 著 (2000)。《合法化危機》(劉北成、曹衛東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人民出版社。
- Jürgen Habermas. (2000). *Hefahua weiji* (Translated by Liu Beicheng & Cao Weidong). Shanghai: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Habermas, J. [1976]. *Legitimation crisis* (T. McCarthy, Trans.). London: Heineman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73])
- Edward Said 著 (2002)。《知識分子論》(單德興譯)。北京：三聯書店。
- Edward Said. (2002). *Zhishifenzi lun* (Translated by Shan Dexing). Beijing: Sanlian shudian. (Original book: Said, E. [1994].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 London: Vintage.)
- 史安斌 (2008)。〈危機傳播研究的西方範式及其在中國語境下的本土化問題〉。《國際新聞界》第6期，頁22–27。
- Shi Anbin. (2008). *Weiji chuanbo yanjiu de xifang fanshi ji qi zai zhongguo yujing xia de bentuhua wenti*. *Guoji xinwenjie*, No. 6, pp. 22–27.
- 朱蘇力 (2004)。〈公共知識分子的社會建構〉，《天涯》，第5期，頁161–174。
- Zhu Suli. (2004). *Gonggong zhishifenzi de shehui jiangou*. *Tianya*, No. 5, pp. 161–174.

- 李金銓 (2004)。《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現代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 Li Jinqun. (2004). *Chaoyue xifang baquan: Chuanmei yu wenhua zhongguo xiandaihua*. Hong Kong: Niujin daxue chubanshe.
- 徐賁 (2009)。《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北京：新星出版社責任有限公司。
- Xu Ben. (2009). *Tongwang zunyan de gonggong shenghuo*. Beijing: Xinxing chubanshe.
- 郭中實、陸曄 (2008)。〈報告文學的「事實演繹」：從不同歷史時期的文本管窺中國知識分子與國家關係之變遷〉。《傳播與社會學刊》，第6期，頁167–191。
- Guo Zhongshi & Lu Ye. (2008). Baogao wenxue de *Shishi Yanyi*: Cong butong lishi shiqi de wenben guankui zhongguo zhishifenzi yu guojia guanxi zhi bianqian. *The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No. 6, pp. 167–191.
- 楊雪冬 (2006)。《風險社會與秩序重建》。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Yang Xuedong. (2006). *Fengxian shehui yu zhixu chongjian*.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 楊雪冬 (2009)。《風險社會理論反思：以中國為參考背景》。取自社會學視野網，<http://www.sociologyol.org>。
- Yang Xuedong. (2009). Fengxian shehui lilun fansi: Yi zhongguo wei cankao. Retrived from Shehuixue shiye wang, <http://www.sociologyol.org>.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Hermann, C. F., (Ed.). (1972) *International crises; insights from behavioral research*. New York: Free Press.
- Rosenthal, U., Charles, M. T., & Hart, P. T. (Eds.). (1989) *Coping with crises: The management of disasters, riots and terrorism*. Springfield, IL.: Charles C. Thomas.

本文引用格式

- 司景新 (2011)。〈共識的焦慮：中國媒體知識分子對危機與風險的論述〉。《傳播與社會學刊》，第15期，頁215–240。